

CS 主编 / 孙宏开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 格曼语研究

李大勤 / 著

民族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编：孙宏开

副主编：徐世璇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均

王辅世

毛宗武

孙宏开

陈宗振

欧阳觉亚

胡增益

徐世璇

梁敏

黄行

照那斯图

戴庆厦

## 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二十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现了不少新的语言。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于 1980—1987 年正式出版。

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人们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可贵的语言材料。为此，我们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

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 审 委 员 会**

**1996 年 1 月**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绪论</b> .....        | (1)   |
| 第一节 人文背景概况.....            | (1)   |
| 第二节 语言特点及语言分布、使用情况 .....   | (24)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28)  |
| <b>第二章 音系及音节结构</b> .....   | (31)  |
| 第一节 语音系统 .....             | (31)  |
| 第二节 声母和韵母 .....            | (37)  |
| 第三节 音节结构类型及语音变读 .....      | (57)  |
| <b>第三章 词汇系统及词的构成</b> ..... | (60)  |
| 第一节 词汇系统 .....             | (60)  |
| 第二节 词的结构方式及新词的构造 .....     | (75)  |
| 第三节 外来词 .....              | (89)  |
| <b>第四章 语法</b> .....        | (94)  |
| 第一节 实词 .....               | (94)  |
| 第二节 虚词.....                | (142) |
| 第三节 附加成分.....              | (160) |
| 第四节 词组结构.....              | (176) |
| 第五节 句子和句子结构.....           | (193) |
| <b>第五章 方言、类型及系属</b> .....  | (216) |
| 第一节 方言.....                | (216) |
| 第二节 语言类型.....              | (232) |
| 第三节 系属问题.....              | (239) |

|              |       |
|--------------|-------|
| 附录 .....     | (252) |
| 一、词汇材料 ..... | (252) |
| 二、话语材料 ..... | (293) |
| 主要参考文献 ..... | (314) |
| 后    记 ..... | (319) |

# 第一章 绪 论

在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县居住着自称为“达族”和“格曼”的两居民群体。人们一般将他们称为“僜人”。格曼语就是其中自称为“格曼”(ku<sup>31</sup> man<sup>35</sup>)的人所使用的语言。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这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描写,并就其方言、类型及系属等方面的问题作点初步的探讨。

## 第一节 人文背景概况

### 一、格曼僜人的分布、族称及历史源流

“僜人”分布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察隅县境内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曲”是藏语“河”的意思。)额曲发源于贡日嘎布山,又被称为贡日嘎布曲,是目前僜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大约有1100左右的僜人居住在河西岸由巨玉到洞冲的狭长地域内,其中自称“达让”(ta<sup>31</sup> ruar<sup>53</sup>)的僜人近1000人,自称格曼僜的人只有约130人左右,且主要集中在额曲下游的撒穷、京都等少数几个村落。另外,在察隅曲上游的一个东支流上还有个叫嘎腰的僜人村庄,村中也聚居着近200名僜人,其中格曼人70名。

察隅曲由额曲和流经察隅县政府所在地吉公村的桑曲汇合而成,向南流经瓦弄,后在亚比曲弄以西转向西偏北方向流去,并在西门里附近先后与杜莱曲、格多曲汇合,最后逐渐折向西南流入印度境内。察隅曲东西偏北的这一河段在国外的文献中通常被

称为鲁稀特河 (Lohit River), 是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的一部分。在流入印度后, 察隅曲 (鲁稀特河) 即在萨地亚以西与丹巴江、雅鲁藏布江汇合为布拉马普特河, 并在孟加拉国与恒河汇流, 最终注入孟加拉湾。除了上述居住在我边防军实际控制线以内的 1300 名左右的僇人之外, 绝大多数僇人都分布在察隅曲中下游两岸以及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中格曼人主要聚居在察隅曲的中下游, 达让人主要聚居在杜莱曲流域, 而格多曲则是格曼人和达让人居住的交叉地带。

僇人是一个族属尚未进行正式识别的居民群体, “僇人” (藏语称之为“僇巴”) 也只是建国后一些官方文件及国内相关文献中对该居民群体的总称。“僇”来自达让语的  $ndeŋ^{55}$ , 原意是“穷”的意思。之所以称为“僇”, 当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藏话音转说”, 认为“僇”是由当地藏人对这两个居民群体的称呼“德日衣”转读而来。<sup>①</sup> 另一种可称为“误解说”。据当地老人回忆, 1950 年, 一支从云南省进入藏区的解放军部队在桑昂曲宗<sup>②</sup> 南部的山林里找到了“僇人”同胞, 当问及他们的身份时, 有达让人随意回答说他们是  $me^{35} ndeŋ^{55}$ , 即“穷人”。从此, 入藏的汉族军人及后来主要由军人构成的汉族干部就把这个源于随意回答而得来的“称呼”误解为该居民群体的“自称”, 并由此扩展到格曼群体。第三种是“达让音转说”。建国初期, 大约是 1954 年前后, 曾有官员就族称的问题征求当地“僇人”代表的意见, 也是一位达让人代表说自己是  $ta^{31} ruoŋ^{33}$ , 由于读得比较快, 就被听成为  $tuŋ^{55}$ 。这个  $tuŋ^{55}$  当时被记录为汉语的“登”字, 后来才加上个单人旁写作“僇”。

---

① 此说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僇人社会历史调查》,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4 页。

② “桑昂曲宗”和“科麦”都是历史上在察隅地区设立的行政区划名称。

除了“僮”这一称名之外，建国前高原藏族<sup>①</sup>还称该居民群体为“那哄”，意为“（大）耳孔”，源自该群体成员穿耳孔、佩带大耳环的习俗。在国外的相关文献里，尤其是在印度的官方文件里，通常把僮人与目前被我国划归到珞巴族的义都人统称为“米什米”（mishmi）。比如在印度政府199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中，“米什米”就包括 miju（米久）、Digaro（迪加罗）、Idu（义都）三个族群，共约29000人。其中的 miju 指的就是格曼，Digaro 指的是达让。

“米什米”这种称名据说来源于印度阿萨姆人的叫法，意思是“未开化的人”。其实，类似的称名在藏族历史文献《贤者喜宴》也有记载：“如是，东方之咱米兴米、南方之洛与门、西方之香雄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均被收为属民。遂统治半个世界。”<sup>②</sup>其中的“米兴米”指的就是达让、格曼、义都三个语言群体。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他称中没有一个得到该群体内部成员的一致认可。就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至少在实际控制线内这个群体的成员之间很少使用这些称名。在谈到自己究竟该使用什么总称时，达让人认为自己同珞巴族的义都人一样都是 dai<sup>35</sup>人，汉字通常写作“代”。至于格曼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代”人，

---

① 察隅县地势由北向南递减，下察隅和上察隅海拔高度在2000米左右，而该县古玉乡往北海拔均在3000米以上。当地人民称古玉以北的藏族为高原藏族，以区别居住在上下察隅的藏族。

② 参见巴卧·祖拉陈哇（1504—1566）著，黄颢译《贤者喜宴》，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17页。

但乐意接受“代”这个称名。<sup>①</sup>

僮人群体中说格曼话的人自称为“格曼”，他们把达让人称为“吉孟”（tɕi<sup>31</sup> moŋ<sup>35</sup>）；同样，自称为达让人把格曼人称为“教”（tɕau<sup>53</sup>）。说义都话的人自称为“义都”（i<sup>53</sup> du<sup>31</sup>），把格曼人称为“米教”（mi<sup>55</sup> tɕou<sup>31</sup>），其中的 mi<sup>55</sup>即是“人”的意思，这与达让人称呼格曼人为“教”是一致的，也说明国外文献中的 miju（米久）源自“代”群体对格曼人的称呼。

达让人、格曼人、义都人自称与他称表

| 族群  | 自称                                  | 他称                 |                                     |                                     |
|-----|-------------------------------------|--------------------|-------------------------------------|-------------------------------------|
|     |                                     | 达让语                | 格曼语                                 | 义都语                                 |
| 达让人 | ta <sup>31</sup> ruɑŋ <sup>53</sup> |                    | tɕi <sup>31</sup> moŋ <sup>35</sup> | la <sup>31</sup> raŋ <sup>35</sup>  |
| 格曼人 | ku <sup>31</sup> man <sup>35</sup>  | tɕau <sup>53</sup> |                                     | mi <sup>55</sup> tɕou <sup>31</sup> |
| 义都人 | i <sup>53</sup> du <sup>31</sup>    | ɕou <sup>55</sup>  | min <sup>55</sup> dau <sup>55</sup> |                                     |

僮人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 300 多年以前。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加之其他语言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僮人历史变迁的具体记载，其历史来源至今不能定论。1976 年、1980 年和 198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先后委派三批学者<sup>②</sup> 前往西藏察隅

① 协助进行这项调查的有：松鸟（格曼人，县统战部副部长）、美志鹏（下察隅镇副镇长，达让人，达让语主要发音人之一）、达尤松（下察隅镇党委副书记，达让人）、松邓龙（格曼人，夏尼村村民，格曼语调查发音人之一，巫师）、小明龙（格曼人，撒穷村村民，格曼语调查的主要发音人）、巴里龙（达让人，副县长）、松布龙（格曼人，县电影放映队队长）、米古丽（义都人，义都话的主要发音人）、阿古松（达让人）等等。此外，有关僮人的其他称谓情况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僮人社会历史调查》一书的第 3-5 页、第 202-203 页。

② 这三批学者分别是：王晓义、吴从众、张江华、王昭武；张江华、陈乃文、陈景源；张江华、陈景源。

县对僜人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调查，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将三期调查成果汇编为《僜人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于199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我们主要根据这部著作，加上我们的访谈笔录简单地介绍一下格曼僜人的历史源流。

据现有的文献及年长者的说法，察隅河地区的格曼人是几百年前由东、西两个不同的方向迁徙而来的。来自东方的格曼人据说原来居住在今缅甸北部迈立开江上游靠葡萄地方的布荣地区。布荣地区与察隅曲的东南支流噶仓河（又称各勒木河）仅一山之隔。在格曼人现有的17个姓氏中，相传来自东部的就有杜西（du<sup>55</sup> ɕi<sup>55</sup>）、布雷（bi<sup>31</sup> lai<sup>55</sup>）、宰（dzai<sup>35</sup>）、德梅（du<sup>31</sup> mai<sup>35</sup>）等大姓，这些姓氏的人构成了格曼人的主体，其中尤以姓杜西的格曼人为多。相传杜西姓的祖先原是两兄弟，分别居住在今缅甸北部柯柔卫和良卫地区，因与当地发生矛盾而背井离乡，后来逃到格多曲上游东支流格西河上游。格西河上游属于无人居住的山区，两兄弟在此靠采集野菜、野果度日。最后被人发现并被带到位于杜西河与格多曲汇合处不远的贝牙布地方居住，由此繁衍成了格曼人中的杜西姓家族。

来自西方的格曼人，据说同达让人一样，是由义都人分化而来的，主要居住在察隅河南岸或前门里以西地区。比如，察隅曲南岸印度境内马陇马地方居住的格曼人以及前门里西南方向的格曼人基本上都源于义都人。后者据说是由柯木代人居住的地区迁来的，所说的格曼话带有明显的柯木代口音，词汇上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不过，无论来自何方，早期的格曼人大都居住在察隅曲的中、下游流域，其上游及额曲和桑曲流域都没有格曼人居住。据当地传说，最早在察隅曲上游和额曲下游居住的是被称为“炯”的居民群体，后来藏人南下，炯人则在与藏人发生的一次激烈战斗后败走，从此下落不明。而后该地区即被藏族居民以及

后来由杜莱曲和察隅曲中下游陆续迁移而来的僜人占据。

察隅曲上游及额曲下游的格曼人主要是由察隅曲中游逆流而上迁徙而来的。少部分是逆格多曲翻越打秋山口到达察隅曲上游的。这些迁来的格曼人先是与由知拉山口陆续迁移过来的达让人分开居住，以夏尼为界：夏尼以下为格曼，以上则为达让。目前除了最近新建的京都村集中了 19 户格曼人外，格曼和达让这两个僜人群体主要因通婚而杂居在上下察隅镇的数个村落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居民中还有一种讲土话的藏人，格曼人将之称为 *dza<sup>31</sup> khɯun<sup>55</sup>*。这些藏人所说的土话，除了明显借自藏语的词汇以外，当地的其他藏民完全听不懂。根据我们调查的材料来看，这种语言有相当一部分基本词汇与格曼语相近，而文化词大多与藏语相近。考虑到他们至今还保留着诸如送鬼等类似于格曼人的风俗习惯，可以初步推断他们可能就是最早到达察隅曲上游的格曼人。

同达让人一样，格曼人有着较为丰富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大部分与宗教习俗有关，而且目前只有年长者及某些巫师才能记诵。据说，讲述这些故事要使用一种与现有的格曼话或达让话有相当差别的话语方式。在这些传说中，比较流行的是“阿加尼的故事”。故事讲述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金人阿加尼创世的过程；（二）阿加尼带领人类与大自然斗争，建立幸福生活的各种神话故事；（三）汉、藏、珞巴、僜四个民族同根分化的过程。不过，我们从其中也难以提炼出有关僜人来源的有价值的具体线索。故事的具体内容请参见附录“阿加尼的故事”。

## 二、自然环境与资源、社会组织与生产方式

### （一）自然环境与资源

包括格曼人在内的僜人世代生息在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这里南临印度，东接缅甸，西连珞渝，北依康藏高原。

整个地形是北高南低，北部高峰达 5000 米，但河谷地带海拔却只有 1000 多米。气候呈山地亚热带季风类型，夏无酷暑，冬不严寒，生态环境多样，适于各种动植物生长、生存。加之山川秀丽，资源丰富，这里常被誉为“西藏江南”。

整个察隅地区山高谷深，河流落差巨大，水势湍急，水力资源极为丰富，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高耸连绵的山区遍布着各种植被，植物垂直分布明显：从高山草甸到大片亚热带松林，往下则有樟、楠、青冈等阔叶林。大片的森林中栖息着虎、豹、野牛、野猪、野羊、獐、猴、狗熊等大型或较大型野生动物；灌木丛及低洼潮湿地带往往寄生着各种经济价值颇高的菌类，其中寄生于青冈树的青冈菌以其口感柔和、味道鲜美及独特的营养保健价值而受到世人的青睐。河谷地区受来自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气候温暖湿润，雨季雨量充沛。

北部的额曲流域和察隅曲上游区域就属于亚热带气候，年温差较大。夏季最高可达 31 摄氏度，冬季最低达零下 4.5 摄氏度，之间相差 20 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达七八百毫米（平均为 773.6 毫米），无霜期为 200 天左右；一般 2 月到 9 月为雨季，10 月到次年 1 月为旱季。河谷两岸则有不少比较开阔的台地或坡地，盛产玉米、鸡爪谷（学名 *Eleusine Coracora*，又称龙爪稷）、水稻、油桐、茶树、香蕉等农作物及兰草、竹子等经济作物。该地区的南部气候更加温暖，自然生态环境更加优越，不仅有棕榈树生长，更宜于各种农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生长种植。比如水稻、玉米、小麦、土豆、甘蔗及豆类、稷类和各种油料作物等。此外，该地区还出产菠萝、柑橘、柠檬、荔枝、木瓜、香蕉、番石榴、苹果、李子、梨子、桃子、樱桃、胡桃、杏等果品。

除了水力、森林等资源之外，该地区还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比如石灰岩、石墨、石英石、云母以及铁、铜矿石等。

## （二）社会组织与生产方式

最初，格曼人是按姓氏聚居在一起的，而早期聚居地的地名往往就是姓氏的来源。氏族内部成员共同占有山林等生产资料，共同消费狩猎及生产所得。进入私有制后，则以家庭为主要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但姓氏作为一种联系家庭私有制单位的纽带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同姓之间有相互帮助的义务。比如，如果个人或某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同姓内其他人有义务在财力、物力上给予一定的支援。极端的情况是，当同姓者被外姓人侮辱或杀害时，同族人有义务为其复仇，不论时间延续到何时；而当同姓人身背命债去世后，同族人也有替代他或她偿还命债的义务。其次是，同姓间有共同商讨本姓氏内婚姻、纠纷、送鬼等重大事务的义务。格曼人群体及其各姓氏内部都没有自己的首领，同姓之内的重大事务一般都是在同宗族之内协商解决的。在协商的过程中通常都是以当事人为主，找同姓中年龄较大、阅历较丰富、能力较强的人共同参与议事。最后，同姓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和共同承担责任的义务。比如同姓的死者没有父亲或儿子时，包括奴隶、土地、房屋、牲畜、生活用品以及妻子在内的一切财富都必须由同姓的男性近亲或远亲来继承。如果有未成年人需要抚养，财产继承人必须负起养育他们的责任。

僮人中通行一种达让话称之为“斗卡”、格曼语称为“齐特”（teit<sup>25</sup>）的习俗，用来对那些违反社会秩序、传统道德规范的人实施强制性的财产罚没或索赔。“斗卡”或“齐特”的范围非常广泛。男子在与女子尤其是与已婚女子发生不正当关系或调戏妇女时要被“斗卡”或“齐特”，偷盗他人的财物或未经允许动用别人的东西也要被“斗卡”或“齐特”；对人不尊重，比如骂人、对人吐口水、甩鼻涕，跨越别人的腿，碰到别人的身体乃至未经允许看别人的挎包等，都会引起“斗卡”或“齐特”的事情发生。出现“斗卡”或“齐特”时，罚没的财

物由受损方当事人提出，小到十几个卢比或随身佩带物品，多达十几头牛或近千卢比。当被罚没者不服或不愿意满足罚没者提出的要求时就可能发生程度不等的社会纠纷。这时，就需要请“各帕瑞”进行调解。

“各帕瑞”(kw<sup>31</sup> phw<sup>31</sup> ɬai<sup>55</sup>)，达让话称为“嘎背雅梅”，主要职责是为异姓之间出现的各种纠纷进行调解。这类人在格曼乃至僇人群体中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威望，而且都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他们善于辞令、阅历广泛、处事公平、为人老练机警，对本族群的历史尤其是过去发生的社会纠纷也有或多或少了解。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调解人的周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有效平息不良事态、化解各种纠纷、维护群体内部秩序的作用。

格曼人多居住在森林地区，刀耕火种、采集和狩猎曾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个体家庭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单位，在生产过程中男女分工明确。男人主要负责砍树辟地，狩猎采集；妇女则负责收、种、禽畜的饲养及大部分家庭手工业操作。

农业是格曼人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产品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主要的生产工具有铁砍刀、铁斧以及自制的木质农具和藤条编织的背筐等。耕地绝大多数是人工开垦的火烧地。所谓火烧地，也就是在大树较少的森林边缘或没有大树的开阔地段砍去乔木、灌木，待其干枯以后通过焚烧而清理出来的农业用地。火烧后留下的草木灰是惟一经过人力加工过的肥料，此外不再施肥。男子开出土地之后就主要由妇女播种、管理及收获。播种有点播和撒播两种方式。玉米、黄豆、四季豆等种子颗粒较大的作物是点种，具体做法是用削尖的本棍在地上戳一个小洞，将种子丢入洞中再把泥土填入踩实。较小颗粒的作物，比如鸡爪谷、小麦、荞子等则是撒播在火烧地上，撒播之后为防止飞禽啄食可能再撒盖一层泥土，但一般情况下是派人守护以驱赶飞禽，直到种子破

土出苗。田间管理工作主要是锄草。在铁器得到普遍使用之前，锄草的主要工具是自制的木质工具，包括木片、削尖的木棍或木锄等。由于耕作粗放，又没有灌溉技术和水利设施，旱涝主要依靠天时，因而产量较低。即使是正常年景，大多数家庭每年收获的粮食都不够全年食用，部分家庭一年当中可能出现将近半年的缺粮情况。

由于经常缺粮，僮人不得不寻找其他食物来源。这样，采集和狩猎就成为各个家庭生活中仅次于农作的重要经济活动。采集工作主要有妇女和儿童承担。每年春夏之交是青黄不接之际，也是僮人采集最为集中的时期，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需要有人上山采集可食用的各种野菜或挖掘野山芋、野芭蕉根等块根来充作食物。采集活动基本上以个人或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偶尔会出现不同家庭之间的合作，收获物则按人平均分配，不计长幼。除了采集之外，僮人妇女还负责山鼠、山雀一类小动物的捕捉。大型动物的捕猎主要由成年男子负责。弓箭和火药枪是主要的工狩猎具，此外还有下地套、挖陷阱、埋尖竹桩等捕猎方法。捕猎的范围很广，包括从野牛、熊、獐、野猪、野羊到猴子、野鸡在内的各种飞禽走兽。但一般情况下不猎杀虎、豹，认为猎杀虎、豹会给人带来灾难或晦气。

除了为获取肉食及用于交换其他生活用品的毛皮之外，狩猎对僮人来说还有着某些特殊的意义。比如，由于山鼠肉干是僮人姻亲来往过程中较为常用的礼物，山鼠的捕猎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兽骨在僮人的眼里也具有特殊的价值：兽骨尤其是大型猎物的头骨一方面可以作为猎手个人能力和勇敢的见证，另一方面和牛头悬挂在一起可以作为财富的象征。因此，对僮人而言，狩猎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除了采集和打猎，格曼人还饲养牲畜。牲畜饲养以牛、猪、

鸡为主，解放后扩大到羊、马、狗等家畜和鸭、鹅等禽类，但比重一直很小。牲畜的饲养以放养为主。牛、马基本上是野放在山上，隔几日前往关照一下。猪、羊、鸡、鸭也没有专门的圈栏，晚上唤回喂食后，猪、羊被赶进“杆栏式”长房的底层以防霜雨，鸡鸭则自己择处而栖。

牛是僮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家畜。主要品种有黄牛和巴麦牛，偶尔有养奶牛的。其中，巴麦牛高大健壮，膘厚肉多，最为僮人所喜爱，但目前已濒临灭绝。从历史上看，僮人早期养牛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于耕作或改善个体家庭生活，而是作为结亲的聘礼或以备送鬼之需。因此，在僮人的基本词汇中，类似汉语“耕牛”这样的词汇是不存在的。作为结亲聘礼，牛起到实物货币的作用。比如，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要讨老婆，最低限度需要给女方家庭送一头牛作为聘礼。如果女方的家庭富裕或社会地位较高，那么索要的彩礼可能多达几十头牛。杀牛大多是在送大鬼的时候，一方面杀牛本身就是送大鬼仪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需要把牛肉作为食物招待或馈赠给参与送鬼的亲朋好友。当然，首先是那些病残老弱的牛会被杀掉，不过需要量大的时候，那些健壮的牛乃至牛犊也可能被宰杀。

牛只有较为富裕的家庭才饲养得起，因此猪就成为僮人饲养最普遍的一种家畜。不过，当地的猪种体形都普遍偏小，一般只长到六七十斤就要宰杀掉。与养牛一样，猪、羊以及鸡、鸭等，也主要用于送礼。比如，在婚事已定但尚未将妻子接回自己家的情况下，女婿每次到岳父家时都要或多或少地捎带一头猪或几只鸡、鸭一类的礼物。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僮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为自己一饱口福杀食家畜、家禽的情况。

僮人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有纺织、竹木加工、金属加工、酿造等。纺织都是由成年妇女负责的，原料是当地产的火麻，工具是几根木棍和木条板简单制成的锯织机，织成的粗布染上颜色后用